

核心阅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全球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等领域蕴含深刻洞鉴，赢得越来越多政府、政党和国际组织的共鸣与支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嵌了三重“赋力效应”，启发、影响和推动了当代大国形象认知、国际关系理论嬗变和全球持续发展进程，这也是其深入人心的内在依据。

□ 鲍传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三重“赋力效应”

“赋力”(empower)一词意指赋予客体力量或使之更为强壮自信，这里的客体既可指人，也可指抽象的物。相应地，“赋力效应”在这里是指强大的思想力量对事物发展过程的有益启发、正面影响和积极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赋予大国形象认知。一个“大国”是在全球范围施加影响力的主权国家。二战后兴起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从两个维度考察大国的影响力或者实力：输入与输出。从输出侧看，大国的实力就是指其战争能力。从输入侧来看，结构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列举了五种实力来源：人口与领土规模、资源禀赋、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政治稳定与政治能力。

这种传统的大国认知在冷战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大国对立造成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何深入人心



了许多国家非此即彼的选择困境。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向纵深发展，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但同时一部分群体的利益在全球化过程中受损，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在特定地区出现抬头的趋势。面对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21世纪的各国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但在环境、健康、知识传播与创新、安全、多边制度与全球善治等领域，由于缺乏市场激励以及存在“搭便车”现象，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全球公共品提供严重不足，阻碍了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步伐。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对于大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期待不断增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积极响应国际社会对于大国责任的预期，明确大国有义务和激励提供更加充足的全球公共品，协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塑造了国际社会对于大国形象的新认知。近年来，中国以更加自信的姿态举办一系列主场峰会外交活动，建设性参与气候变化、金融治理、国际维和、疾病防治等国际议事与实践，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得到进一步巩固。

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达沃斯论坛

上的演讲引起强烈反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进一步引发国际共鸣。2018年达沃斯论坛上，各国领导人竞相呼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中国的开放愿景以及对保护主义的抵制受到普遍欢迎。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赋予国际关系理论嬗变。有学者认为，冷战结束以来，西方主流理论没有积极响应国际社会的期待，尤其是缺乏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更公正合理国际秩序呼声的现实观照，导致西方所谓主流学派使用的概念词汇已经不能适应当代形势与现实，以西方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亟须得到调整。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雨伞术语(umbrella term)，为国际关系理论嬗变提供了一个研究范畴，在此范畴中，各种学派努力寻求理论假设和推理逻辑的最大公约数。

在东西方话语碰撞与相互“拿来”过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演进培育了求同存异的开放视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新型国际关系和新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大国沙文主义；强调全球伙伴关系与多元外交，反对强权

政治与单边主义思维；强调开放国际格局与共同发展，反对探底竞赛与保护主义逻辑；强调全球治理秩序和文明交流，反对零和博弈与狭隘主义论调。这些理论洞见观照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以及世界面临突出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现实，必将有力推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全球持续发展进程。人类命运共同体根植于全球发展，为全球发展合作廓清了认知迷雾，奠定了理论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中方坚定支持联合国所设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在贸易开放、气候治理、精准扶贫、国际援助等方面创新引领，取得巨大成就。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全球发展合作实践注入了理论活水，中国自身构建过程中最典型的实践是“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着力打造绿色、健康、智力与和平的丝绸之路，理念与实践成就被写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相关决议。根据商务部统计，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达7.4万亿元人民币，基础设施项目、自贸区谈判、对外援助等稳步推进，与沿线国家金融合作、人文交流越来越紧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与沿线国家在经贸等领域签署近280项合作文件，成为推动全球发展合作的机制化平台。

此外，中国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17年成员国达到84个。建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等，为全球发展提供金融支持和服务。中国积极参与太空、深海、极地和网络空间等“高边疆”(high frontier)治理的全球协商与标准制定。发起主办世界互联网大

会，推动信息丝绸之路建设，倡导建立多元透明的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发布《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与有关各方共建“冰上丝绸之路”，为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建设性作用。

进一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深入人心

加强“从内到外”与“从外到内”的信息收集与分析。在新媒体和数字化时代，要特别注重国别信息与数据处理，通过分析一国的政治经济体系、执政结构、政治文化等，对该国参与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的背景与能力作出判断，这是一种“从内到外”的信息收集。另一方面要注重系统性的或“从外到内”的研究，即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整体层面分析一国的可能反应。国与国之间差别巨大，单纯的国别研究难以厘清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也疏于考虑国际竞争施加于所有国家的不同影响。加强相关信息收集与分析，有助于准确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国际传播现状并作出相应动态调整，更好展现其当代价值与赋力效应。

提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介入、影响和引领国际叙事能力。中西话语的竞争，包括概念、叙事和传播手段等，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会继续上演，甚至会愈演愈烈。根植中国这片发展沃土，中国学术和政策机构的研究成果越来越为海外所关注。在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国际叙事框架中，中国声音和中国方案要赢得更多的喝彩，还需要在人才机制、翻译传播和理论创新等方面进一步加强。

一段时期以来，哈佛大学教授格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T.Allison)创造的“修昔底德陷阱”成为国际政治热词，尽管其背后的逻辑受到广泛批评，但却成功吸引了中美两国

政界和学界的注意。中美两国都清醒地认识到，如果这一陷阱成为现实，其对于世界和平与发展进程的影响将是难以估量的。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维考量分析中美大国关系，而不是基于传统的霸权理论，才能拨开“修昔底德陷阱”的乌云，见到“新型大国关系”的青天。引导与完善中美关系的国际叙事，是中国学术界与智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深入人心的重要抓手。

推动形成更具赋力效应的国际合作体制。当代国际合作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广泛和深入。必须看到，合作不是终点，而是实现其他多种目标的手段。合作并不总是好的，国际政治经济中不合作优于合作的例子并不鲜见，因而要克服在不同语境不加区别地谈合作的倾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张的合作本质上是国家政策的相互调整与适应，是一种比霸权稳定更具赋力效应的国际合作体制或结构。正如著名国际政治学家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所论证的，国际合作体制赋予政府，而不是束缚政府。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中国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通过“一带一路”等国际发展计划与治理制度创新，中国经验为北南合作、南南合作提供一种务实方略。当代发展中国家面对“逆全球化”思潮和“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在积极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过程中，需要打破线性发展的思维定式，正确处理效率与分配公平、生态保护等的非线性关系，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意。

热点透析

很多人认为，美国的崛起主要得益于两次世界大战，或者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大量移民等，这是非常肤浅的理解。作为一个原欧洲殖民地，美国在一个交通不便、远离当时世界经济科技中心的新大陆迅速发展，经历了大约百年时间，综合国力跃居世界前列，引领了世界第二次产业革命到来，直至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全世界五心（制造中心、创新中心、科学中心、金融中心和全球治理中心）合一的霸主国家，使得20世纪成为美国世纪。美国崛起速度之快、质量之高令人惊叹，其经验值得后来者借鉴。

抓住产业革命机会，实现快速崛起

1620年，102个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帆船从英国出发漂洋过海在北美定居开始，到今天不过400年的历史。最初，北美大陆不仅属于英国，而且是法国、西班牙等欧洲诸强的殖民地，直到1776年7月4日，北美13个殖民地发布独立宣言，才成为名义上的一个国家，当时那里只有200多万人。后来，美国历经多年的独立战争、美西战争、向西开拓，以及19世纪中叶的南北战争，发展并不太平。但是，从1776年仅仅过了100年的时间，亦即1880年左右，这个年轻的国家就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更令人惊叹的是，又过了40年左右的时间，亦即20世纪初，美国悄然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不仅GDP总量是英国的2.5倍，法国、德国的3.5倍，而且人均GDP也超过英、德、法诸国。

更重要的是，这时美国经济结构和创新活力也展现出强大优势，例如在钢铁、石油及其化工、机械制造、铁路和轮船运输、电报技术、电力、汽车等新兴产业领域，美国都在全世界几乎形成了垄断性优势。今天看来，美国在19世纪迅速崛起的经验令后来的日、韩等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都相形

推动由制造中心向创新中心和科学中心转变

□ 吴金希

见拙。

促进新发明率先实现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和大众化，这是美国19世纪经济崛起的最突出特征。实事求是地讲，美国经济在19世纪的崛起并不因为其科学技术的领先优势，相反，直到二战以前，美国在科学研究上与德国、英国、法国等老牌科技强国还有差距，从文艺复兴、科学革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欧一直是世界的科技中心。

但是，这并没有影响美国的创新驱动发展。尽管新的科学发现、新的技术发明来源于欧洲，但是，新科学、新发明往往在美国而不是在欧洲实现了产业化。产业的创新、经济的发展从来不是取决于谁最先发现了科学原理，而是取决于谁最先将科技成果转化成生产力，这方面，19世纪的美国为后来者提供了很多经验。尤其是将科技成果标准化、规模化、大众化的经验和做法值得称道。在很多新兴产业，美国不仅实现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技术革命，而且实现了生产体系革命。

企业家精神及全民创新活力是美国崛起的根本保证。欧洲在文艺复兴以后逐渐觉醒，后来的地理大发现、宗教革命、科学革命、产业革命促进整个欧洲焕发了勃勃生机和活力。但是，作为一个移民社会和清教徒向往的新大陆，美国在创新活力方面更是胜欧洲一筹。

纵观19世纪的美国，它真正是一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土，

是一个创业英雄辈出、企业家精神涌现的时代，无数创业的精彩故事迄今让人叹为观止。后世美国人也承认，是这些创业者缔造了美国，他们不仅在短时间内改变了美国的命运，而且影响了全球产业竞争新格局。

不断进行体制机制创新。除了企业家精神和创业活力之外，19世纪的美国不断完善有利于创新创业的体制机制。例如，公司制度的推广、专利制度、资本市场的发展等。

总之，这一系列重要制度的完善是美国大众创新创业改变国家命运的制度前提。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历史性过程，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定力

今年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中国GDP总量从1978年的仅为美国9%发展到2017年的超过60%，而且几乎是日本的2.5倍。但是，毋庸讳言，我们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我们的制造业竞争能力与发达国家还有几十年的距离，产业迈向中高端将是长期任务。

现实中很多年轻同志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缺乏清醒认识，甚至竟有这种论调，认为中国科技、经济以及综合国力已经超过美国。这种盲目自信与过去曾一度盛行的中国经济崩

溃论一样，是需要我们高度警觉的。

从产业国际竞争态势看，中国的情况有点类似于1880年的美国。当时，美国制造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一，但是创新能力、科技发展水平还远不是欧洲诸强的对手，还称不上世界制造强国，更不是创新强国和科学强国。欧洲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动荡不安，大量顶尖科学家纷纷涌入美国，直至二战期间达到顶峰，尤其是深受迫害的犹太人。可以说，从1914年到1945年，美国享受了30年的欧洲人才红利，然后在二战后一跃成为“世界科学中心”。从世界的“制造中心”到“创新中心”，再到“科学中心”，美国经历了三个阶段、超过半个世纪的耐心等待，为二战后美国成为全球“五心合一”的霸主国家奠定了基础。

同样，今天在大多数成熟技术产业领域，中国的生产制造能力已经全球第一，但是，我们制造业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于低成本竞争，在创新能力上差距还很大，我们还不是全球的创新中心，更不是科学中心。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在产业竞争的国际较量中，中国还远没有到敲锣打鼓庆祝胜利的时候。

夯实现代化创新体系，赢得对发达国家体系性竞争优势

未来30年是中国经济由大到强、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关键时期，我们不能急功近利，要做长期打算，不能过分看重短兵相接的胜负，要着眼于长期战略目标和体系性的竞争优势。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确是一条根本大计，其核心在于打造现代化创新体系，没有现代化创新体系就谈不上现代化经济体系。

当前在研发经费、科技人员、发表论文、专利申请等量的比较方面，我们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科研产出质量不高、产学研融合深度不够、体制机制障碍等问题还比较突出。

没有分工就没有效率。创新与科学研究的关系复杂，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科学研究重在发现科学规律，而创新是将新发现转化成新产品和服务的过程；前者是学术活动，而后者则是一种经济活动。那种认为在基础科学领域大量投钱就能实现产业弯道超车的观点是典型的线性思维，已经被实践证明行不通。我们在很多情况下将科研和创新问题混淆，导致政策措施失当，专业分工不清，加之普遍存在的单位利益纠葛，我国创新体系普遍存在大而全、小而全的现象，导致同质化低水平竞争和过多的学术泡沫。

从美国崛起的经验来看，制造中心、创新中心和科学中心是一个先后有序、不断发展的过程。现阶段，我国可以称为全球制造中心，但是离全球创新中心和科学中心还有一定的差距，中国尚没有在基础科学领域全面赶超美国的资源和

实力。

现阶段应重点瞄准产业共性技术搞创新，扎根中国大地写论文。中国当前仍处于工业爬坡阶段，在半导体、航空发动机等重要产业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上受到发达国家的严格封锁限制，亟须整合国内科研力量攻克瓶颈，填补国内空白，带动我国产业升级。但是，这些对我国极端重要的研究成果未必成为在国际上显示度很高的论文。屠呦呦没有发表过多少国际性论文，但是她的理论解救成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成为新中国科技界的骄傲。

事实上，自1980年代以后，美国去工业化的趋势导致美国大学也存在脱实向虚的不良倾向，因此，当前衡量美国大学的标准绝不应该成为评价中国大学的唯一标准，否则必将导致中国大学研究脱离中国实际，变得虚化和泡沫化。中国大学、科研院所必须用主要精力把论文“写在中国的大地上”。

小企业 with 自由市场是社会创新活力的根本保证。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大繁荣》作者埃德蒙·菲尔普斯曾经说过，没有哪个国家找到过能替代自由企业焕发经济活力的机制。中小企业是国家创新活力之源，因为它们代表了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的发展方向，在某种程度上说，小企业决定了国家的未来命运。衡量一国创新体系优劣，关键要看该国是否形成了更有利于中小企业成长的环境。

我们要在体制、机制、文化方面形成优良的创新生态，用好市场规模和人才规模这两个战略性资源。创新永不止步、改革永不停歇。推动实现制造中心、创新中心、科学中心、金融中心、全球治理中心“五心合一”在中国落地生根，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梦想。

战略视角